

北方史界人物

顾 问	孙进己	冯永谦	张泰湘
主 编	李俊武	周光培	
副主编	郭建文	张志立	冯季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北方史界人物

顾 问	孙进己	冯永谦	张泰湘
主 编	李俊武	周光培	
副主编	郭建文	张志立	冯季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齐书深

封面设计:石 箴

北方史界人物
李俊武 周光培等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印刷厂 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38
字数:860,000

1991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

ISBN7—207—00641—1/K·55

定价:60元

序

《北方史界人物》拖了好多年，现在总算和大家见面了，但当时奋斗在史界的这些人物，大部分已退休了，有些已作古了。因此这本书在某种程度说已过时了，但从另一角度言，却又是保存了一批相当珍贵的资料。好在当时出版此书的目的主要并非为这些人扬名，而是想为后学者提供一些科研道路的借鉴，要在这个意义上说，此书目前出版不仅不过时，而且正是当时，正为新一代北方史界人物的成长，提供了明镜。

回忆当初，我倡议编写此书之时，正是我和周光培同志合作编辑出版《北方史地丛书》之时。当时商定是由我联合东北学者编写一批史地著作，由周光培同志承担印刷、发行一切经济责任，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列入计划的。

由于1987年——1989年，我正忙于国家项目《东北历史地理》，就将此事委托给郭建文、张志立、冯季昌，当时赞助此事的还有张泰湘、冯永谦。稿子很快就汇集上来，他们几位也做了认真的编辑工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齐书深同志等也认真做了编审工作，已定下来要出版了。但第一次征订回来，不足一百本。以这样的订数，要付印，周光培同志在经济上也承担不起。此书就只好搁了起来。1991年，我办起了沈阳东亚研究中心，又想起了印此书，张泰湘同志又热情地为此书拉来了李俊武同志五千元的赞助，我们想面向社会征订不行，试向作者征订，如每人二本，还可销个三百本，加起来勉强够数了，不料再次征订结果，社会上仍只订了数十本，作者也只订了数十本，这点印数怎能开机？当时中心经济也拮据得很，承担不起这亏损责任。我只得表示待过一二年，中心经济好转些时，我们豁出去赔上一二万，印几百本，卖不出去大家分了看看也好。这样又一搁置几年。这次决心付印，并不因为中心现在有钱了，而是因为一拖多年，人事全非，无法再拖下去了。再困难也决心赔上一笔，把它印出来。

此书原来命名是《中国北方史学家传》，但出版社当时为了社会更易接受改名为《北方史界人物》，现在仍沿用了旧名。

此书原拟邀请的是东北内蒙研究地方史的学者，没打算邀一些研究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学者，后来邀稿过程中，也邀来一些研究中国史和世界史学者的稿件，既邀来，又感到这些学者加入进来，为此书增添了光彩，就都收了进来。反正称为《北方史界人物》也是可以的。但结果还有不少研究中国史和世界史学者的传记没收进来，此收彼不收似不好，但限于篇幅，也就无法可想了。

此书我先后读了三遍，每读一遍，都颇有感慨。这些学者的成长都太不易了。诸多因素的凑合，才算成长起来这群学者。在二十世纪的后半世纪，为北方史学作出贡献，放出光彩。

首先，要有一个良好的客观环境，有些人说“逆境成才”，但实际上真正完全在逆境中

成才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有些人在逆境中坍掉了，有些人则在逆境中挣扎，终于等得了或争来了顺境，真正成才还是要在顺境中。如本书中的很多学者，没有新中国的建国，他们就根本不可能获得读书的机会，也就不可能有以后的成就。又如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这一代人也就都在“运动”中葬送了，他们中不少人正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得以走上科研岗位，取得了今天的成就。这是指大环境。而要真正成才还要有良好的小环境。本书所列的学者几乎都是在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就说明了这一点。大环境好，但个人的小环境仍未改善，仍在小县城，仍在非科研单位，个人再努力，也难在科研上有较大成就。

其次，是要有良好的素质。总的看来，本书所收入的各学者，大都是智商偏高的，他们早在青少年时代，在学习上就胜同学一筹，同时他们的兴趣、特长都是偏近文史的。所以不少人弯曲迂回了一大圈最终还是走上了研究历史的道路，有些人更是抛弃了官职或优职，自愿来坐这冷板凳的。这就是说，这些人适合于研究历史。事实上人人都有才，但各人的才却不同。有许多人的未能成才，大都和他的才与他从事的工作不适合有关，而得以成才的许多人，又都和他们从事的工作，正好能充分发挥他的才能有关，因此，可以得出结论，本书所收入的各学者都是具有研究历史的良好素质，才得以有所成就，如去干别行，或许就会变得素质较差，不能胜任，而无所成就。

第三，是这些人都比较勤奋，他们都能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劳动，没有这种过人的勤奋是不会有成就的。同时，他们的勤奋还有一个特点，是能持之以恒。一曝十寒式的勤奋，大约不可能获得他们这样的成就。

第四，是这些人大都研究得法，以往有些人讨论学者成功之路时，往往片面强调勤奋的作用。而忽视研究之是否得法。事实上，正确的科研方法，往往更为重要。不得其法，再勤奋也是无用，或至少是事倍而功半。科研得法，则事半功倍。加之于勤奋，就自然会有成就。至于何谓得法，各人条件不同，专业不同，其法也各有不同。但总的也有相同之处：这就是凡是本书中有成就者都能善于承前人成就，善于学取他人长处，善于独立思考提问，敢于创新，破除成见。

第五，是这些人大都有良师益友指导帮助。本书许多学者的成长都是各有其良师益友的诱导、帮助，往往一位好老师一个好朋友可以影响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但同一老师所教的学生并不一定都行，这也就在于是否能善从其师，善取其友。

此书我在编校过程中，是读了好几遍，每读一遍都颇有所获。因此，我热忱地将此书推荐给有志于研究历史者，看看前人走过的成功之路，一定会帮助自己走上成功之路。

孙进己

目 录

序	孙进己(1)
考古、教学、科研回忆	游 寿(1)
勤学苦干 百折不挠	汪宇平(5)
为研究北方民族史作贡献	林 干(8)
塞外考古自述	张 郁(11)
七十自述	陈光崇(15)
为学铺路逢盛世,发减鬓白更加鞭	金启琮(19)
踏遍青山人未老,还将余年做贡献——李健才传略	郭志昌撰(22)
一介书生	徐恒晋(25)
做一个历史规律的探索者	崔春华(27)
不断追求 不断探索	陶 炎(31)
在东北近现代史研究领域辛勤耕耘	常 城(35)
老牛自知黄昏晚,不待扬鞭自奋蹄——李莲传略	段静修撰(37)
路仍迢迢	薛 虹(41)
治史三诀——准、恒、思	孙克复(45)
锲而不舍 甘当铺路石	刘兴华(49)
史学生涯三十年	董万岩(53)
学程自述	张博泉(59)
博约相得 贵在坚持	鄂世镛(66)
花甲存稿	吴 枫(69)
为发展首都的文博事业甘尽己责	赵其昌(77)
平凡的自述	任 众(80)
揭晓千古之谜,打开草原考古局面	米文平(85)
为祖国史学的繁荣效弩钝之力	李荣华(89)
通往国际史坛之路	张德良(93)
在繁博的基础上求简约	张玉田(97)
翻译与科研之路	郝建恒(101)
王承礼简况	王承礼(104)
学校·思想·探索	黄凤岐(110)
学海无涯 勤奋治学	董克昌(114)
币海耕耘话沧桑	李 侠(118)

学然后知不足·····	郭清树(121)
经历和学业·····	邓中绵(123)
学术小传·····	孙 机(126)
动荡与探索·····	赵连泰(130)
荒漠上考古者的足迹·····	李逸友(133)
我的研究道路·····	吕光天(139)
以科研为己任·以解决问题为最大乐趣——记刘永智·····	张志碧撰(144)
追求真理 百折不挠·····	孙进己(148)
我研究民族学的回顾·····	赵复兴(158)
我在充满阳光的道路上前进·····	赵 展(162)
致力文物考古工作 足迹踏遍长城内外·····	郑绍宗(166)
严谨治学 一丝不苟——记洪用斌·····	史 峰撰(171)
本人传记·····	张云樵(173)
自传·····	刘文鹏(176)
以加倍努力抢回在治学上失去的宝贵时光·····	孙孝恩(179)
我之治史·····	张 英(183)
我的小传·····	许明纲(186)
内蒙古文物战线上的老兵·····	郑 隆(190)
欢歌治史话春秋·····	孙文良(192)
平凡的学术生涯·····	于志耿(196)
我研究清前史和清前宫廷史的收获·····	铁玉钦(199)
灯下挥毫·····	傅朗云(202)
夺回失去的时间·在科研道路上前进·····	王秉忠(208)
治史回顾·····	王明阁(211)
科研实践加深了我对事业精于勤的理解·····	张森水(215)
求学自述·····	王可宾(222)
在求索东北远古奥秘的道路上·····	姜 鹏(225)
科研力程回顾·····	满都尔图(228)
硕果累累 不断攀登——记李殿福·····	司马鹿野撰(232)
开拓地方史志研究的新局面·····	李澍田(237)
我的小传·····	刘凤翥(240)
时代赋予地方史研究的课题·····	赵广庆(244)
北方民族史研究的经历和心得·····	卢明辉(247)
愿做科研道路上的开拓者·····	田志和(251)
愿循已经搜阙遗·····	马 赫(254)
对北方民族史研究的几点体会·····	陆思贤(258)
求学、治史漫忆·····	潘喜廷(261)
奋力拓荒 耕耘不辍·····	穆鸿利(265)

学史漫笔·····	冯继钦(270)
科研之路·····	魏福祥(276)
甘为北方史研究贡献力量·····	姜守鹏(279)
在黑土地上辛勤耕耘·····	吴文銜(282)
人生在勤 不索何获·····	王雅轩(288)
自强不息,献身文博事业——记蒋颂贤·····	马 冰撰(291)
跋涉在黑水大地·····	朱国忱(294)
我的考古经历·····	许玉林(300)
我所走过的教学与科研之路·····	郑川水(305)
韩康信传记·····	韩康信(308)
热心培育青年的金史学者——陈国良·····	巩建嘉撰(312)
我走过的路·····	中笑梅(316)
我的求学与治学之路·····	孙秀仁(321)
我的科研成果·····	杨 泓(327)
我的考古与学术生涯漫述·····	冯永谦(333)
科研小传·····	王振科(343)
我的业务情况·····	宋兆麟(345)
爱,使我不断地研究探索·····	李士良(350)
我在蒙古史研究方面的探索之路·····	余大钧(356)
在编辑和治学的热土上耕耘·····	袁闾琨(359)
我的小传·····	何俊哲(364)
我与北方民族史研究·····	曹永年(367)
“画石山”上寻画人·····	盖山林(369)
三十年的教学生涯与学术研究——记关捷·····	晓 伟撰(378)
求实述历史,据理著文章·····	丛广玉(385)
自述学程·····	孙玉良(387)
学习,再学习·····	蒋秀松(391)
教学与科研小传·····	王崇时(397)
文史并举 自强不息·····	宋楨焕(399)
学史纪程·····	魏国忠(404)
生命不息 奋斗不止·····	夏家馥(410)
我的小传·····	宋德金(414)
拼搏十年 稍有成果·····	邢安臣(417)
在治学的漫长征途上大步前进·····	李兴盛(421)
志存高远 自学成才·····	董学增(427)
锲而不舍 执着探索·····	杨 旻(432)
我的成长之路·····	齐 心(438)
如饥似渴地学习,争分夺秒地工作·····	高恩林(444)

北国考古生涯·····	陈相伟(447)
我与史学·····	孟广耀(452)
松花江畔话春秋·····	张泰湘(458)
内蒙古草原的考古生涯·····	田广金(464)
我的学术生涯·····	景 爱(467)
脚踏实地 努力奋斗——记杨余练同志的一生·····	王冬芳撰(476)
不走他人老路·····	杨茂盛(480)
我的学术生涯·····	林 沅(482)
我的科研经历与体会·····	史金波(487)
求学、探索、拼搏·····	王佩环(492)
甘做边疆民族史研究的奉献者·····	古清尧(496)
从微观着手解决宏观问题·····	陈 浣(498)
科研忆往·····	姜相顺(502)
后学的自励之路·····	李治亭(505)
我的研究简况·····	林树山(512)
我的小传·····	姚 凤(516)
背靠过去,面向今天和明天·····	董守义(519)
在东北史地研究中沧海拾贝·····	王绵厚(523)
我的考古教学生涯·····	魏存成(527)
后学晚行者·····	吴振强(531)
草原、山岭足迹·····	刘景文(534)
为适应工作而努力学习,为探求真理而努力工作·····	王冬芳(538)
回顾我的治学道路·····	李宇峰(542)
紧密结合业务工作,开展地方史志研究·····	柳成栋(546)
困境中志在求学 斗室里誓写春秋·····	冯季昌(550)
致力于北方萨满教研究·····	王宏刚(556)
努力为文物考古事业多做工作·····	张柏忠(558)
走上治史之路·····	翟立伟(562)
我的业务经历·····	庞志国(565)
努力做好党史研究工作·····	戈福录(567)
为实现目标而奋斗、进取·····	张志立(573)
在研究辽史道路上前进·····	杨若薇(576)
开阔视野,扩大思路,把研究引向深入·····	赵永春(578)
触热点,爆冷门·····	沈 毅(582)
条件要靠人去创造·····	傅 波(584)
刻苦钻研 开拓新的园地·····	唐 进(586)
踏着历史的足迹跋涉·····	王禹浪(591)
更新史学方法、开拓研究视角·····	刘 庆(594)

考古、教学、科研回忆

游 寿

我于1906年旧历9月13日出生在福建省霞浦县城的一个四世读书的教育家庭，汉族。1911年入地方小学，1918年小学毕业。1924年进省城福州女子师范学校，1925年毕业。这时正值“五卅”惨案期间，我参加了青年学生运动，经朋友的介绍读了一些左翼作品。不久，反动政权在福建抓学生，我便回到老家当小学教师兼一些挂名行政职务。1927年离开福建，1928年进南京大学当借读生，第二年正式入学。记得当时有胡小石先生讲甲骨文字。这时河南安阳发现完整的甲骨，上面刻有文字“××”。有人说是“获白麟”，小石先生说：“没有白麟，《史记·齐世家》：‘苍兕苍兕……’当是野牛，青牛常见，白牛不常见。”后来，考古生物学家说是野牛骨（近年各地也发现野牛骨），在战国时大青牛是很多的，牛皮也用到军事上。于是我想考古必先学得扎实，尤以文字作基础。依靠多学一点常识，然后再窥研究之门。这时中央研究院正在安阳发掘。虽然有报导，却看不到什么实物。我从知道殷代甲骨文开始，就感到这是一门崭新学科，自己决心着重在文字学上下一番苦功，省得学习上出漏子。有一天在课堂上遇到曾昭燏，她在外语系一年级，先来听课，试听教授如何说。我叫她转中文系，学文字学，再学一点古文献、考古文物，这样前途较广阔。她在第二年转到中文系。以后我们共同构写了甲骨文前后编，用蝉翼笺影写的，请胡小石先生题词。我随带身边多年，可惜在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在南京失掉了。

当时在南京我有机会看到中国不少故宫文物，是要在英王加冕时，送出国展览的，先在中国展出（大概这批文物现在台湾）。我感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不只是“四部”的文献流传，而物质上却更丰富。我决心从事考古是在此时定下的。一个人的学习在大学时就要定向。

旧中国考古学者不是从考古科班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锻炼出来的。记得有人告诉我一个趣闻，当考古队伍初到河南发掘，遇到新石器时代墓葬，有陶罐和蜷伏的无发尸体，便叫起来，这是“和尚坟”。然而，这些人后来都在发掘中锻炼成为名家了。

我在当时也只能找到某些金石资料，用历史文献来互证。我真正踏进考古门槛，是在1943年以后。我在四川的白沙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时，曾昭燏从国外回到昆明，又辗转到四川乐山的李庄山中，她要打开“善斋”一批青铜器，便找我去。在旧中国，一个研究金石的人能看到拓片，就可满足，现在能看到许多青铜器，太好了。于是我辞掉教学工作去参加。在这阶段，我不但参与整理“善斋”青铜器，而且还看到留在箱库中未发表的安阳青铜器。听

梁思永先生口述东北昂昂溪考古工作、细石器文物等，这给我以后离开山东赴东北搞考古工作有很大的启发。在李庄山中，我认识了许多学术界人物，如李济先生，他是在国外学考古的。此外，有梁思永、夏鼐，研究人类学的凌纯声和吴定良，向达则专攻唐史及敦煌学，搞语言研究的有李方仲，董作宾独揽了甲骨。他们各搞一门，但互通消息，有时开个报告会。由于凌先生和向先生是南京学友，有时互相谈谈所学，有时也流露出依人之叹。当时的头头傅斯年却感到秀才难伺候。

在这种情况下，我进入了学术门槛。当时我虽然也看到一些甲骨，但只许看不许问。当时我有一个想法，学术门甚多，一个人为什么要往死胡同里走呢？面前有一大批墓志拓片，没有人问津。因此我便整理这些拓片。我的一些金石文章题跋就是这时写的，而《李德裕年谱》也是此时找到的，大概是三易稿了（1986年始印就）。

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投降。这时，我也回到南京，到1951年我去济南。在这几年中，中国考古又有了重要发现：1. 四川王建墓发掘；2. 南京南唐二陵发掘；3. 山东济南沂南汉墓发掘。虽然我都在这些地方，然而却未能参加，有的因交通不方便，有的正在教学中或有其他任务。不过在济南时，如城子崖、谭城、大辛庄和千佛山下的古墓发掘，我却都看过。城子崖断崖上仍留有黑色蛋壳陶。后来，我到泰山、曲阜，还看到周公庙的遗址。尽管发掘的人走了，那里还剩下一些陶片，和城子崖陶片造型有相同之点。

我以为，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不可能参加所有的发掘工作，但要看，要了解、综合、分析，论其异同。中国历史悠久，土地广博，发现既有这么多，不知道的更不知多少！向多方面学习，“转益多师是我师”。我的考古就是在这样的不断学习中得来。

在山东学习的机会很多。在山水沟地摊上可以谋到一些名贵文物；走出校门，爬上千佛山，可以看到精美的雕刻。当时，有一件事让我不能忘怀。一天，一位青年同志和我攀藤、批草，把我拉上千佛山的另一个山头黄石崖，那里横排几处北魏造像，雕刻精美。一个洞穴正视是个形态，侧视又是另一形态。全国各地的天女绘画是披衣、衣褶飘动，而黄石崖上的舞女却是裸体的，人体曲线、舞姿刻画细腻。两年之后，荆三林将其发表了。我对拓拔魏文化，也是在这个时期作了了解。1963年在《哈尔滨师范学院学报》发表《拓拔魏文化史稿》一文，虽然由于未到山西大同，关于雕刻方面内容未能刊出，可是，却为我在1982年考定鲜卑人在黑龙江嫩江定居的事做了准备。

1957年，我来到哈尔滨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在一个星期天，到黑龙江博物馆参观，看到一些文物很珍贵，但都只是开个眉目，许多问题并没有着落。后来我认识了赵善桐同志，他借给我一些资料，是一些外国考古者在侵略者支持下所作，这些人匆匆而来，恍忽而去，并没有研究出什么问题。1960年本院历史系成立。赵善桐约我到哈市黄山看出土的大象牙。黄山又叫荒山，是冲积的黄土山。在硅瓦厂处，他送给我们一个大象牙白骨，由于他的协助，我们了解了黄山地形。他还介绍我们踏看了由水沟分开的南北城，采集了一些肢骨制作的工具。在断崖上看到沙水冲积各断纹。我对东北地理重新读起，这可说是我野外工作的开端。

1961年，我们到牡丹江发掘了一个月，发现了从新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十二个坑位。这些遗存，大约是渤海建国时期留下的城堡。第二年，我又到嫩江地区考察了西边的几处细石器遗址。这些遗址说明黑龙江文化以嫩江为界，分东、西两面。古代两大区民族

不同,土壤给人民带来的生活也不相同。嫩江区多游猎、牡丹江区有农耕。这里有大型磨制石器,还有打制细石器,一部分是用黑曜石,而在黑龙江黄山却有上述两种形细石器,既有嫩江区细石器,同时还有牡丹江区黑曜石细石器。

1981年以后,我感到自己做了两件于考古有意义的事:一是替黑龙江、内蒙古解决了鲜卑族古代历史地理上的疑案,即找到了横亘在嫩江上游的大兴安岭古代鲜卑族所在的山洞,今叫嘎仙洞。此洞于1980年发现。另外是我回南方考查了日本十七次入唐使船漂流到中国海,所记载的唐代长溪县赤岸村。近年日本真言宗空海法师代致贺能上长溪县看到赤岸表:“惟八月初日,乍见云峰,欣悦极,过赤子之得母,越旱苗之遇霖。”这是空海在海上看到赤岸的描述。1984年以后,日本真言宗信徒四次到赤岸朝拜。我考察了赤岸之后,回到北国。

我多年考古,对于这两件工作感到是平生最满意的。虽不是由我一人所做,但通过自己对文献留意,将其用到考古上,解决了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可以给来者提供依据。

我现在已是80岁以上的人了。考古和文献分不开,过去自己经常是有了发现就待到十年、廿年,看到国内走得差不多,不能解决了,这时才发表。如寿县蔡侯墓,我在《左传》上,对蔡国事是熟悉的,但由于发掘者、研究者对该墓文物一开头就错,于是全国很多研究者都跟着错,只一字之差,把时代、语言、人物都搞乱了(注:见《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1期),许多争论问题不了了之。直到1980年我的旧作才得以问世。我有感于此,便志在扶植新生力量,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主要论著目录

- 1.《考古学讲义》,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油印本1961—1966年三改。
- 2.《历代书法选》(一集),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石印本1963年。
- 3.《历代书法选》(二集),哈师大影印1985年。
- 4.《殷契选释》(合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 5.《李德裕年谱》(手稿影印),《北方论丛》1986年。
- 6.《黑龙江考古初探》,《黑龙江日报》1962年6月13日。
- 7.《黑龙江省和内蒙古呼盟旧石器晚期工具》,《北方论丛》1981年1期。
- 8.《命名与古代歌舞》,《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9期。
- 9.《寿县蔡墓与蔡吴楚三国史事》,《南京大学学报》1981年1期。
- 10.《善斋骨器整理回忆》(影印),南京博物院五十周年纪念论文1984年。
- 11.《金文与诗书论证》,四川华西金陵大学《斯文》半月刊。
- 12.《金文策命与赏赐仪物》,四川华西金陵大学《斯文》半月刊。
- 13.《金文武功文献》,四川旧中大《文史哲》1946年3期。
- 14.《贝币浅说》,《历代货币》1985年1期。
- 15.《先秦至汉钱币》,《历代货币》1985年1期。
- 16.《汉以后钱币》,《历代货币》1985年1期。
- 17.《古度量工具与人体关系》,第二次人类学会论文,选入论文集;并见《人类学通讯》。
- 18.《对人类学工作一点建议》,《人类学通讯》1984年81号。
- 19.《吾乡赤岸》,《霞浦报》176期,1985年5月24日,并见专刊《空海入唐之路》。

- 20.《霞浦赤岸代序》,《空海入唐之路》1985年9月。
- 21.《赤岸拾翠》,《福建画报》1986年4月。
- 22.《拓拔魏文化史稿》,《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3期。
- 23.《大兴安岭祝文跋》,复印本。
- 24.《拓拔魏祝文发现》(论北碑),手稿影印。
- 25.《楚辞琐谈》,北方丛书1984年。
- 26.《楚汉之际人物成败》,1942年华西坝《斯文》半月刊二期。
- 27.《商颂年代》,四川《学灯》。
- 28.《六朝人苦闷》,四川《学灯》。
- 29.《梁天监五年造像跋尾》,四川中央图书馆刊1945年。
- 30.《梁守谦墓志与唐代宦官》,四川中央图书馆刊1947年。
- 31.《书苑楼锦》,四川刊1943年。
- 32.《论历代书法》,《历代书法选》序1985年。
- 33.《书法随笔》,《北方书苑》1984年2期。
- 34.《书法流派师承》,《霞浦文史》1985年2月。
- 35.《负极老人传》,霞浦志,《文史资料》1984年2期。
- 36.《炳烛斋手稿介绍》,《福州文物》1984年1期。
- 37.《闽渝记》,四川《斯文》1943年。
- 38.《山中间居志》,四川《斯文》1944年。
- 39.《司后鼎出土记》,(南京)《中央日报》1947年。

主 要 著 作 目 录

1.《空海入唐之路》(1985年9月)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2.《赤岸拾翠》(1986年4月) 福建画报出版

3.《拓拔魏文化史稿》(1963年3期)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报出版

4.《大兴安岭祝文跋》(复印本)

5.《拓拔魏祝文发现》(论北碑) 手稿影印

6.《楚辞琐谈》(1984年) 北方丛书出版

7.《楚汉之际人物成败》(1942年) 华西坝《斯文》半月刊二期

8.《商颂年代》(四川《学灯》)

9.《六朝人苦闷》(四川《学灯》)

10.《梁天监五年造像跋尾》(1945年) 四川中央图书馆刊

11.《梁守谦墓志与唐代宦官》(1947年) 四川中央图书馆刊

12.《书苑楼锦》(1943年) 四川刊

13.《论历代书法》(1985年) 《历代书法选》序

14.《书法随笔》(1984年2期) 《北方书苑》

15.《书法流派师承》(1985年2月) 《霞浦文史》

16.《负极老人传》(1984年2期) 《文史资料》

17.《炳烛斋手稿介绍》(1984年1期) 《福州文物》

18.《闽渝记》(1943年) 四川《斯文》

19.《山中间居志》(1944年) 四川《斯文》

20.《司后鼎出土记》(1947年) (南京)《中央日报》

勤学苦干 百折不挠

汪宇平



我是辽宁省辽阳市人，满族，生于1910年农历二月初一。曾任内蒙古博物馆研究馆员，兼任大窑文物保护管理所负责人，九三学社社员。1988年3月退休，经过返聘，继续工作。1926年我于沈阳东关初级中学毕业，1929年在沈阳北陵第三高中毕业，然后升入上海复旦大学。因东北沦陷，经济困难，1936年在北平中国大学毕业。“七·七”事变后，在武汉参加“东北协会”，任《东北周刊》编辑。1940年在重庆“东北协会”任《东北》月刊编辑。在此期间曾为四川三台东北大学历史系翻译日文有关东北史地的大量资料，另由其它出版社出版了《东北素描》、《东北边防形势论》等书。1935年到1945年的十年间，为反满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介绍东北史地情况，发表了大量短文，在东北沦陷和抗战时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46年回沈阳。最后在沈阳日报社任社长，直到1948年解放为止，1950年到北京。

1951年9月从北京来内蒙古文教部，担任文物考古工作。1953年参加中央考古训练班第二期，其后在内蒙古各地为考古调查发掘做了大量工作。1951至1956年间，曾对内蒙古东部区的各盟市进行调查，在新石器时代和辽代古城遗址方面，很有收获。1956年前往伊克昭盟南部萨拉乌苏河进行调查，发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河套人文化遗址和河套人顶骨、股骨等化石，在考古学上意义重大。

1963年以后，在西部区各盟市进行调查，在新石器时代遗址方面取得重要成果。同时在大青山后发现了打制石器，从此受到启发，认为大青山前必有旧石器。终于在1973年9月，在呼和浩特市东北方33公里保合少乡大窑村南山发现了一处大规模的石器制造场。发现以后，曾在当年及其以后数年之间在呼和浩特市东郊及其它有关盟旗县市进行广泛调查，全部骑自行车，行程在八千公里以上。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多处。其中有数处地层明确、石器丰富或与古生物化石（如原始牛等）并存；所发现的中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只有少数埋藏在全新世地层内部，而大部分散布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地层表面，不见陶片和磨光石器，这在考古学上，具有重要意义。

广泛的考古调查使我认识到：大窑村南山的石器制造场文化，不仅在内蒙古自治区，即使在我国北方广大地区，在规模、地层以及地上散布和地下埋藏方面，也是不可多得的。

因此决心以大窑为基地,建立机构开展工作,以图这项工作的进一步发展。

1976年秋季进行正式发掘。其后,1979至1983年继续调查发掘,取得了很大收获。现将发掘情况分为几个方面,介绍如下。

这处石器制造场遗址,由卧龙山、骆驼山和凤凰山三座山构成,以卧龙山为主,面积实达170万平方米。它以太古代的花岗岩、花岗片麻岩和燧石为基岩。燧石产量丰富,质地坚韧,是原始社会人类制造工具的好原料。基岩表面到处覆盖着第四纪地层。这种地层在卧龙山下半部发育得特别良好。其地质年代从中更新世开始,经晚更新世的早期、晚期以至全新世的早期和晚期,到处分布,可谓全面。由于水土流失,在卧龙山周围冲成土沟八道,沟崖厚度约在5至15米之间。它们有时是一层例如晚更新世的马兰黄土,单独存在;有时在它的上部复盖一层全新世的砂质土。大多数情况下是在马兰黄土之下埋藏一层中更新世的离石黄土,即红色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卧龙山四道沟的中段有一处沟崖,经过发掘,发现上层马兰黄土与下层离石黄土之间夹有一层晚更新世早期的淡红色土,成为三个不同地质时期叠压在一起的地层。它们的内部分别含有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时期的文化遗迹遗物,成为旧石器时代的“三叠层”,厚14米,长24米,在考古学上是一项重要发现。

如此发育的地层内部所埋藏的文化遗迹遗物,自然容易带有长期连续性了。所以,从中更新世离石黄土的底部发现了石制品、灰烬遗迹和肿骨鹿烧骨化石。其具体年代,用热释光法对烧土进行测定,为 315000 ± 28000 年。用古地磁法测定肿骨鹿为59万多年。在我国北方地区,这个年代是相当早的。

从中更新世早期淡红色土地层中发现了石制品、拟布氏田鼠、鸵鸟蛋残片及其它啮齿类化石,如三趾跳鼠等。从晚更新世晚期马兰黄土层中发现了石制品、披毛犀、原始牛和扭角羚羊等动物化石。从此可知这处石器制造场已经在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时期都有人类劳动、生息和繁衍。

旧石器时代之后,进入中石器时代。在卧龙山北坡二道沟北口的上部半米厚的全新世地层和下部马兰黄土层之间,有个文化层,厚约30厘米,内含大量打制石器,而且器型变小,技术进步,不见陶片和磨光石器。因此,这是一处中石器时代遗址,估计其年代约在1万至8千年前,成为第四个时期的文化。

中石器时代之后,进入新石器时代。在卧龙山南坡八道沟北崖,发现一处遗址,面积约达25000平方米。当地有三道小沟,在沟崖半米以下发现3处居住遗址。另与北大考古系大窑考古工作站实习师生共同钻探,得知地下尚有房址数处。采集石核、石片和石器共百多件。陶片纹饰以绳纹为主,素面次之;色调以红褐为主,灰褐次之;彩陶仅见一片,应属仰韶文化晚期,距今约5000年,为内蒙古大青山前所罕见。

由此可见这里有五个时期的文化,从六七十万年之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到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为止,这里都有人类活动,并且留下了大量的遗迹遗物,真是奇迹。既然是石器制造场,就应当有些石块经过人类开采,并且在它们表面留下痕迹,事实正是如此。从旧石器时代早期就有人类在这座山上开采石料,制造石器。他们开采过的大块燧石,表面疤痕累累,周围石渣遍布,其数目达70块,编为70个号。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开采过的大块燧石,约有25块,编为25个号。旧石器时代晚期,从地层内发现的和山上暴露而经

过人类开采的,共达 380 多块,编为 380 多个号。而地层内所埋藏的,没法计算在内。从此可知:在这几座山上经过人类开采的大块燧石,共达 500 来块,这是迄今各地所未见的。

因此可以认为:这处石器制造场,历史悠久,长期连续;地层发育有“三叠层”;遗址遗物特别丰富,在我国北方的远古历史发展上处于重要地位,自不待言。

在将近四十年的工作中取得这点成绩,当然是无可称道的。不过,这点成绩的取得,也是自己用百折不挠的精神,通过勤学苦干才取得的。因此,至今想来,从事考古工作,特别是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只有顽强拼搏,甘心奉献,才能在工作上有所成就,这可说是我的一点心得。

主要论著目录

- 1.《伊盟萨拉乌苏河考古调查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 4 期。
 - 2.《内蒙伊盟南部旧石器时代文化的新收获》,《考古》1961 年 10 期。
 - 3.《呼和浩特市东部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发掘报告》,《文物》1977 年 5 期。
 - 4.《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文化的石器工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 年。
 - 5.《内蒙古阴山地带的石器制造场》,《内蒙古文物考古》创刊号。
 - 6.《呼和浩特市大窑村南山四道沟东区旧石器时代石器制造场 1983 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7 年 2 期。
- 其它考古调查报告等 40 余篇。

为研究北方民族史作贡献

林 干



1916年3月生于广东省新会县。汉族。1941年秋——1944年冬就学于贵阳大夏大学法律系。解放前在天津育德法学院法律系任教。1957年从天津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研究。1961年调往内蒙古语文历史研究所,1979年转调内蒙古大学,仍继续研究古代北方民族史。1981年被评为副教授,1985年晋升为教授。早年研究匈奴史,随后研究突厥史,近年又研究东胡史。兼任:中国蒙古史学会理事、中国中亚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史学会顾问、《中国历史大辞典》北方民族史分册编委、《蒙古历史辞典》编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内蒙古社会主义学院名誉院长。已出版的专著有《匈奴通史》、《突厥史》、《东胡史》等九部,发表学术论文三十篇(详见下文“目录”)。完成了北方三大系统的全部学术“工程”。

林干的治学方法,先从收集第一手资料(包括文献、金石、考古)入手,其次总结前人(包括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其三就所研究的民族或范围分别写出专题论文,最后在专题论文的基础上写成专著。他主张收集的资料要经过整理、鉴别和考订。第一手的保留,第二手的舍弃。保留的资料要考订其真伪和年月,并按年月或分类依次排列。总的要求是:搜罗全面,内容精确,使用方便。他认为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目的在于了解国内外学术界对自己所研究的民族或范围达到什么程度,那些问题业已解决或未完全解决,甚或尚未有人接触,以便开辟新领域,创造新方法,提出新见解,探索前人所未解决或未完全解决的问题。

林干的论著,多发前人所未发,有的填补了民族史上的空白,故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人民日报》国内版、海外版,《瞭望》杂志海外版,香港报刊,新华社对外新闻和对外英语广播等,对他的学术成就均经常报道。他的著作,有的已被译成蒙文出版;《中国历代各族纪年表》1982年由台湾木铎出版社大量翻印,畅销台湾、香港、东南亚及欧、美各国。他的三本代表作:《匈奴通史》被国家教委列为优秀著作,收入《全国高等学校社会科学研究成果选编》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突厥史》亦于1989年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一等奖,同年参加在山东省举行的第四届北方十五个省市(区)十七家出版社“社会科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荣获“优秀图书奖”;《东胡史》1991年